

湖湘

武培干 著 朱发建 校点

中国国际贸易史 中国国际贸易概论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库

武培干 著
朱发建 校点

中国国际贸易史 中国国际贸易概论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 / 武培干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355-7246-2

I. ①中… II. ①武… III. ①对外贸易—中国 IV.
①F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5477 号



湖湘文库 (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史 中国国际贸易概论

著 者 武培干
点 校 朱发建
责任编辑 符本清 喻亚中
特约编辑 陈 丹
责任校对 鲍艳玲 刘 萍 郑 璐
装帧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epn.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n.com
地 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印 装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50.75
字 数 565000
书 号 ISBN 978-7-5355-7246-2
定 价 102.00 元

ISBN 978-7-5355-7246-2



9 787535 572462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言

朱发建

武培干（1898—1990），字佛航，湖南溆浦人，中国著名的国际贸易学家。

他于1898年2月16日生于湘西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武兆溪是一位落魄穷秀才，靠耕读为生。武培干4岁入私塾启蒙识字，8岁时进入溆浦县桥江三义宫南通书院读书。时值庚子国变之后，清政府为延缓覆亡的命运，被迫推行“新政”，废除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大力提倡新学，引入西方教育体制，设立新式的学校教授新学。1908年，他考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开始接触到西学课程。1912年，转入位于常德的省立第二师范附小，由于以前在溆浦没有学过英语等课程，开始时对功课感到十分吃力，但他以“一刻值千金，分秒必爱惜”的精神发愤苦读，补习以前没有学习过的课程，不仅很快赶上了其他同学，而且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高等师范附中。191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

校，当时在这里聚集了一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在钱智修、杨端六等教授的影响下，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经过几年的学习与刻苦钻研，他对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心得，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论文。1921年3月，《东方杂志》刊载了他的《国际版权同盟与中国》一文，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亦由著名经济学教授杨端六推荐公开发表，1922年，他的《联省自治与职业主义》发表于《太平洋》3卷7号。在大学期间，他就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

1921年大学毕业后，为谋生他前往上海，应聘为商务印书馆会计员；1924年转任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编辑。他谦虚好学，得到叶圣陶、沈雁冰、郑振铎、王云五的热情指点，数年间，学问大有长进，编刊之余，埋头著述，先后在《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新生命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200多篇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出版了《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中国关税问题》、《鸦片战争史》等专著，译著《人口问题》也正式出版。一时名声显扬，上海多所高校争相罗致，纷纷邀请他前往任教，于是，他又兼职在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商学院讲授国际贸易学课程。在当时全国高校中，他是第一个开设国际贸易课程的中国教授。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在湖南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有不少湖南革命志士流亡上海，生活困难，武培干在上海接济、保护了不少革命者，有的就隐藏在他家里，或者为他们介绍工作，借以维持生计，渡过难关。1928年，他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到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后改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任副教授，后兼任国际贸易系主任、教务主任。1933年8月，转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并代理院长职务。随

后，又相继出任中华书局总公司理事兼账务部长、上海信昌洋行杂货部经理等职。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侵略、掠夺中国的步伐，武培干对此极为担忧，先后以“武昌鱼”、“武干”、“孤航”等笔名，在《东方杂志》、《自力旬刊》、《新社会》等期刊上发表《万目睽睽的日本对华新政策》、《由国际经济上观察帝国主义的中国分割》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唤起国人的警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由于他在经济学界的声誉与影响，日伪政府以高官厚禄为诱饵，逼迫他加入敌伪政府为其服务，但他坚拒不从，1941年率全家离开上海，辗转福州等地，返回湖南溆浦老家。在湖南期间，他先出任位于吉首的省立商专教授，兼工商管理系主任、教务主任，不久又转任南岳湖南省立商专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被聘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导师，南京国民政府又聘他为运输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并参与处理国际贸易事宜。不久，湖南大学自湘西回迁长沙后，为重建学校师资，校长胡庶华“强拉硬扯”，重金礼聘他为湖南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商学院院长，于是，他又回到家乡湖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培干再次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国际贸易系主任。1952年8月，由周谷城、严北溟介绍，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4年，他调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顾问，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经济贸易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干部和学术带头人。“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批判，在承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

折磨时，仍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十分关注。1982年1月，他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夙愿得以实现。1990年2月2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2岁。他一生兢兢业业，在高校从教60余年，教书育人，为祖国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贸易人才；他勤奋钻研，著述丰富，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国际贸易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被学术界誉为“国际贸易学权威”、“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著名专家”，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多次获得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教育工会、国家外贸部的表彰奖励。

二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东来，中国国门被动打开，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了西方列强争权夺利的战场，丰富的矿产资源及廉价的农牧业产品使中国成为西方工厂的重要原材料供应地，外国商品如水银泄地般涌来，由此也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由于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逼之下，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之下发展起来的，因而表面上看起来是日益“繁荣”，实际上是“畸形”发展，由此，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担忧。为抵抗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不少爱国人士提出振兴民族经济，扩展对外贸易，与西方进行“商战”以救国的主张，武培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早在武昌商业专科学校读书时，武培干就有志于研究中国商业贸易问题。1924年，他撰写的《中国商业状况述评》一文发表于《太平洋》杂志，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都发表文章与其商榷，他又不断撰写文章予以回应。当时国内发生“五卅惨案”，为抗议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全国人民掀起拒用

英、日货运动，商界人士也高唱对英、日“经济绝交”论调。有感于国内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热潮，他决心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经过几年的辛勤探索，1927年他写出了《中国国际贸易史》专著，次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六章，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起源到近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分为启蒙期（汉初至隋末）、进展期（唐初至明中叶）、闭关期（明中叶至鸦片战争）、近代期（鸦片战争以降）四个发展阶段，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作了钩玄提要式的叙述，并将每个时期的特点、对外贸易的主要国家与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交换商品、中国政府对外贸易的政策与制度等，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自古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及商品贸易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是中国最早关于中国国际贸易史研究的专著。

《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实际上是《中国国际贸易史》一书的姊妹篇。在《中国国际贸易史》第五、六章中，主要论述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兴起的历史背景与主要趋势，但于其中详细情形，因限于著作体例及篇幅，未能尽述；于是，在完成该书之后，他马上着手撰写《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一书，1929年完成书稿，次年出版。全书共分十章，对近代（主要是1864—1927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趋势、主要进出口货物、对外贸易主要国家与地区、对外贸易商埠分布情况、对外贸易的交通运输、国际汇兑与金银贸易、关税政策与制度、国际贸易差额及抵偿方式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研究，最后，还总结了我国对外贸易不振的原因，提出了振兴对外贸易的策略。全书主要依据《中国海关关册》及各种统计资料，同时参考了许多国外学者的著作，对近6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作了全面的研究与描述，资料十分丰富，论断精准，很有说服力；特别是作者花费大量心血精心编制

的 60 余幅统计图表，直观地描述出中国对外贸易各方面的具体情形及发展趋势，对读者了解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的概况，及研究者把握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书出版后又多次再版印行：1930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1932 年再版印行；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又相继据商务印书馆原刊本影印发行。

《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两本专著的出版，奠定了武培干作为中国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学术权威的地位，此后，他又不断对中国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细密的研究。1930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中国关税问题》专著，对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关税渊源、近代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破坏、海关行政权的丧失、近代关税制度及缺失、关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如举办世界博览会，就是各国为拓展国际贸易、展示国家形象、振兴民族经济的一种重要举措，因而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举办世界博览会；为推动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发展，早在 1929 年，他就专门撰写了《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一文，详细介绍了西方万国博览会的由来、近代以来各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情况，同时也追述了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历史，以及国内举办的一些区域性商品博览会情况，并大力倡导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博览会事业；其对我们了解世界博览会的历史、近代中国参与博览会的情况，以及推动我国博览会事业的发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此外，作为一位爱国的经济学家，武培干还十分关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1935 年 1 月，他与王新命、何炳松、孙寒冰、黄文

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 9 位知名教授一起，共同在《文化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在当时西方文化席卷全球、中国文化日益衰败的情势下，对如何维护中国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倡导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以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和主张。70 余年后我们重读此文，其中的许多思想及文化意识，对当今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此次《湖湘文库》选择武培干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两书合为一集出版。两书原版为繁体竖排本，今改为简体横排；此次点校，主要依据初刊本与再版本对校，于其中文字错讹、标点符号不规范等，一律径改。为保持著作原貌，原书中图一律影印；原书使用文字有些与现行通行语言不尽相符，原汉字数码中的小数点用间隔号圆点等，一律保留不予更改。

中国国际贸易史

序

愚编著此书，有二原因：一、中国各种专史，现在至感缺乏，无以供学界之需求，而以中国经济史为尤甚；愚尝有志于此项研究，而以范围过广，骤难卒业；适因近数年来，搜集中西交通及有关商业之史料较多，故特草此书以为尝试。二、愚最近另编《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一书，对于现代中国国际贸易之各方面，皆有所论列；但于历史的背景，不能兼顾，故特于此书详言之。惟愚学识溷陋，谬误之处，诚恐不免；海内明达，倘能进而教之，是所深幸。

此书之成，得力于友人之助力者良多，而上海亚洲文会、东方总商会诸图书馆，供给以参考之便利，尤所心感，均此致谢。

中华民国十六年元旦，武埭干，于上海

第一章 导言

中国商业，起源极古。《易·系词》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据此可知：我国自有农具之发明，即有商业存在；惟当时所谓商业，要不出“物物交换”之经济范围耳。迄至周代（西历纪元前一一二二—前二四九年），商业渐盛：周时全国官吏，统于六官；而天、地两官兼理商政。天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地官大司徒颁职司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以登万民，六曰通财，谓商贾阜通货贿也。此外复设市官十一种，管理各种市政商务，据《周礼》所载，其典章灿然，正无多让于近代商业完备之国家也。而国际贸易之起源，殆即肇于此时。《周礼》所述当时天下邦土组织，分为九服九畿；其中，要服以内之六服名为九州，九州以外则夷、镇、藩三服，均称蕃国；此等蕃国所受待遇，与诸侯迥别，既无定期朝贡之事，惟遇酋长代替之时以及王者即位之时，一度朝贡而已；其贡物亦复无定，各以其所宝贵者为贄，而中国亦即以本地产物，赏赐有加；因此遂成为国际贸易之最初形式，亦即所谓“物物交换”者是也。^①

^① 国际贸易之最初形式（primitive form），大都起源于国际赠答礼物，即所谓朝贡报聘是也。此于中国尤属显见，以致后来列国来华商贾，多有冒充贡使之事，后文将更详言之。

朝贡之制兴后，远方诸国之慕义而来华朝贡者渐多：史称越裳氏等，至重三译而来朝，各携方物以与周室交换货物以去（《通鉴纲目》：“周公相成王，立六卿，制礼作乐，天下大治。越裳氏重三译来献白雉与象，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辎车五乘，皆为指南之制；使者载由扶南、林邑二国海际，期年而至其国。”又《尚书大传》亦载来朝事）。此与西史所称，雅相吻合。西史载称，各国商人纯以通商为目的者，至此亦有来华贸易之事：据英人多格拉士所著《欧洲与远东》书中所云，当时各国商人之来中国贸易者，至有八国之多，而均以现时粤南一带为通商地焉（Chong Su See: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转引 R. K. Douglas 所著 Europe and Far East 书中所述）。

外此尚有一事，尤可称为国际贸易制度之雏形者，即周室诸侯，凡数百国；此等国与国间之通商交易，亦即含有国际贸易制度存在。考当时各国间之通商往来，因界限甚严，必赖玺节以资证明；玺节即由“司关”掌之。据《周礼》郑注：“凡货物之自外来者，即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然后销售。至于货物之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然后输出。”（《周礼》郑注卷四）此种符节制度，盖已异于昔时所谓“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礼记·王制》篇）之自由贸易制度，而成为天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之一矣；与后来（明时）中日船舶通商时代之“金叶勘合”制度，尤相类似（金叶勘合制度详见《明史·食货志》；下文述中日贸易时当略述之）。于此可见我国国际贸易制度发达之早焉。不过当时所谓各国，多为中国现时之各省区，以今日之地域观之，要不能视为真正之国际贸易也。

降及春秋战国，列国之注重商业，且远过于周代。管仲相桓